

真如丛书
妙灵主编

刘立夫

著

弘道与明教

《弘明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立夫 著

弘道与明教

《弘明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 / 刘立夫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真如丛书 / 妙灵主编)

ISBN 7-5004-4379-X

I . 弘… II . 刘… III . 弘明集 - 研究 IV . B 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169 号

责任编辑 施 言 冯春凤

责任校对 芒 仁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编 妙 灵
副主编 圣 凯 黄夏年 刘元春
慧 明 光 慧

总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一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

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

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情，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 1944 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作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璽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序

《弘明集》是南朝梁僧祐编纂的一部旨在“弘教明道”的论文集。文集收录了自东汉至南朝之齐、梁五百多年间教内外人士有关护法御侮、弘道明教的文论书表五十七篇，加上后序共五十八篇。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一时期佛教之基本教义、传布状况及佛教与儒、道等社会思潮的相互关系，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重要文献。

作为一部护法弘道论文集，《弘明集》的宗教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在佛教东传之初，由于中土人士对于佛教所知甚少或知之不深，加上佛教的许多仪轨制度与中国的礼教颇多差异，其思维模式亦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迥然有别，终于导致教外人士、特别是儒、道二家对佛教进行诸多非难和攻击，值此佛教生死存亡之际，《弘明集》中许多论文在从正面阐发佛教的义理同时，又对社会各界、特别儒、道二家的许多疑难、攻击进行辨析，使人们对佛教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佛教的传布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弘明集》的价值不仅限于宗教方面，由于其中的许多论文内典外书兼收，方内方外并论，且引证翔实，铺陈详备，保存了许多正史、俗书之外的文献资料，乃至历代遗编、散佚名著亦多所搜集，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此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论的：“六代遗编，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传世者，颇赖以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五）

此外，《弘明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弘明集》中的许多思想，诸如形神关系、夷夏之辨、报应理论、佛教与王道政治的相互关系及三教一致的思想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儒、释、道三教相互关系及三教一致的思想，对于研究中国古思想发展史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极具史料和思想价值的历史文献，长期以来未能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曾对其中之神形关系、三教一致思想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就大陆学术界而言，似尚未有人从总体上对该文集的思想内容及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刘立夫的《弘明集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弘明集研究》基础部分是立夫君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特点是把《弘明集》放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大背景下去进行考察，在较深入地探讨了《弘明集》中神形关系、报应理论、夷夏之辨及三教一致等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弘明集》的文献价值和历史地位，资料翔实，分析亦较细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后，立夫君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扩充，这是作者多年来对《弘明集》的研究成果，它的出版对于人们全面了解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弘明集》、全面了解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都将会有助益，所以很乐意把它介绍给大家。

赖永海

2003年国庆于南京大学

ABSTRACT

In the first 500 years including the late Han, WeiJin, and South – North dynasties, with the culture of Indian Buddhism coming into contact, collision and exchange with that of China, numerous arguments and debates took place among some of the educated Chinese Buddh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including Confucian and Taoist scholars. This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was, fortunately, systematically recorded in Hong Ming Ji, a document collection of the Buddhist history, with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Dharma and expounding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The book was compiled and written by Seng You, who was a famous master specializing in the Buddhist disciplines in Liang dynasty and spent most of his monastic life at Jian Chu Temple in Yang Zhou.

Hong Ming Ji has established its fam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ver since it came out. Not only was it collected into almost all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East Asia including China, Japan and korea, but it has a single version in wide cir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and irreplaceable in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y, Confucian school, Taoism, relations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lives of the period from the East Han to Liang dynasties. However, up to now no special study of i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our academic

circle, nor a standard version of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fact, there really needs an overall project for its revising, annotating, checking or translat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book, thus making it easy for the reading public. Besides, most of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and allusions in the book should be textually criticized, the contents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s and debates also need a new judgement and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al standards.

My dissertation will basically concentrate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s, the deba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Teachings (Confucian school, Taoism and Buddhism). Several other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Hong Ming Ji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hey includ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mptiness (空), the dating of Indian buddhism spreading to China, The age of the coming out of Mo Zi Li Huo Lun (牟子理惑论),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Wei Jin, South ~ North dynasties. Finally, most of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and allusions in the book are given.

目 录

总序	妙灵(1)
序	赖永海(1)
abstract	(3)
导 论	(1)
第一章 《弘明集》概论	(13)
第一节 《弘明集》的思想内容	(13)
第二节 《弘明集》的版本特色	(26)
第三节 《弘明集》的作者分析	(41)
第二章 《弘明集》中的因果报应之争	(47)
第一节 业报轮回说与善恶报应说	(48)
第二节 业报轮回说在中土的流行	(56)
第三节 《弘明集》中的因果报应论争	(63)
第四节 对因果报应论争的历史评价	(86)
第三章 《弘明集》中的形神之争	(94)
第一节 补特伽罗与精灵不灭	(95)
第二节 晋宋之际的形神之争	(103)
第三节 齐梁之际的形神之争	(125)
第四节 形神之争与上帝存在的证明	(140)
第四章 《弘明集》中的夷夏之辨	(148)
第一节 夷夏之辨的文化渊源	(149)
第二节 顾欢《夷夏论》与夷夏之争	(155)

第三节	《三破论》与夷夏之争	(176)
第四节	夷夏之争的余波	(192)
第五章	《弘明集》中的沙门与王权之争	(204)
第一节	出世的佛教与大一统王权的矛盾	(204)
第二节	《弘明集》中的沙门不敬王者之争	(209)
第三节	沙门不敬王者论的现实结论	(239)
第六章	《弘明集》补论	(244)
补论一	《白黑论》对缘起性空说的误解	(244)
补论二	《明佛论》对佛教传入时间的提前	(258)
补论三	关于《牟子理惑论》的著作年代	(267)
附录	《弘明集》用典考注	(282)
参考文献		(408)
后记		(415)

导 论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前后即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同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本土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最后融入到中国本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时间长达一千余年之久。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不仅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包容外来文化的恢廓胸怀，也在于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具有中国传统所缺乏的特定内容，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古代印度具有浓厚宗教传统，各种宗教都很发达，但是，只有作为印度教旁系的佛教输入中国以后，被接纳和容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开花结果，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① 这决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偶然，除了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外，还由于佛教文化的宗教精神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契合了人类的某种内在需要，同人类的主体愿望遥相共通，因而它能够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界线，得到世界诸多民族的认同。

跟世界其他宗教相比较，佛教具有相当强大的宽容性和适应能力。佛教在不影响其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尽力迎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作出适应性的变通，进而演变成具有

^① 佛教在世界各地区虽然都得到了适应性的改造和发展，但以中国佛教的教理体系最为发达。

风格各异的民族化佛教。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信徒尽管信仰的宗派不一定相同，但无论什么宗派都无一例外地承认释迦牟尼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说教，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佛教的基本主张。这说明佛教在它的传播发展过程中，既坚持了灵活性的应变策略，同时也坚持了原则性的不变主张，权变与不变在佛教那里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只是佛教单方面的“方便法门”的努力方向。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都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阻碍，它的传播和发展决不是风平浪静的。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也不例外，怀疑、批评、讥讽甚至暴力打击时有所闻。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历代封建王朝在文化上基本采取以儒家学说为主，同时兼容其他各家的政策，这就为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佛教受到冷落、歧视、排挤或者打击的命运。当然佛教方面决不会袖手旁观，而是奋起抗争，通过教理、教规上的改造和学理上的辩论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这种状况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而以佛教在中土最初传播和发展的五百年间尤为突出，这段时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

佛教传入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自秦代起，中国就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汉代的中国已形成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前列地位。中国的学术思想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已经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文化形态。如果说在秦代以前还是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杂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竞流的局面，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融儒、法、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说为一体，建立起名为“儒术”的

经学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意识形态中的体现。自汉代中期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始终保持了它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难以动摇，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主流形态。儒学重视人伦日用、关注现实的传统一直被强调，这一传统成为抵制本土宗教发达的重大力量，同时也对外来的宗教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和制约力。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没有发展出定型的本土化宗教。秦汉以前，我国流行的是祖先崇拜、先王崇拜、神仙方术、鬼神观念、卜筮星占等较为原始的多神信仰。直到东汉顺帝到灵帝时（公元前2世纪中叶），才由道家思想、神仙方术、阴阳五行、民间巫术等多种因素相结合，发展出早期的道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化宗教，佛教的传入，对道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佛道两教在中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行发展的。但是，以本土宗教自居的道教对外来的佛教有着本能的拒斥意识。

佛教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中国，有其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有其发展的不利条件。它组织完备、教义系统、教理发达，它那灭苦求解脱的宗教理想对处于苦难深渊的广大民众来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心灵安慰和同情，并许以来世的天国幸福，这些正是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前所未有的。因此，它完全可以被改造和转变成民众的信仰，也能够得到上层集团的支持，成为神道设教、稳定人心的重要力量。这是它有利的一面。但是，中国毕竟有着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它那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稳定的宗法伦理，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多元式的宗教信仰，都会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产生排斥和抵制作用。因而，佛教不可能得到全盘的吸收和顺利的发展。这是它的不利的一面。事实上，中国人对佛教采取的是一种“中体西用”的政策，“中学”是体，“西学”是用，佛教只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辅助和补充，而最终不能超然于世俗政权之外。这就是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